

袁宏道集箋校



I214.8/22

袁宏道集箋校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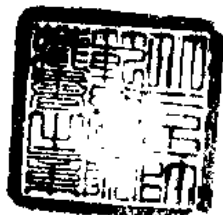
〔明〕袁宏道著
錢伯城箋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827903

827903



14.8/2-2

袁宏道集箋校

下

〔明〕袁宏道著
錢伯城箋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827908

827908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袁宏道集笺校

(全二册)

〔明〕袁宏道著

钱伯城笺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68.75 插页11 字数1,205,000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

统一书号: 10186·256 定价:(精) 7.75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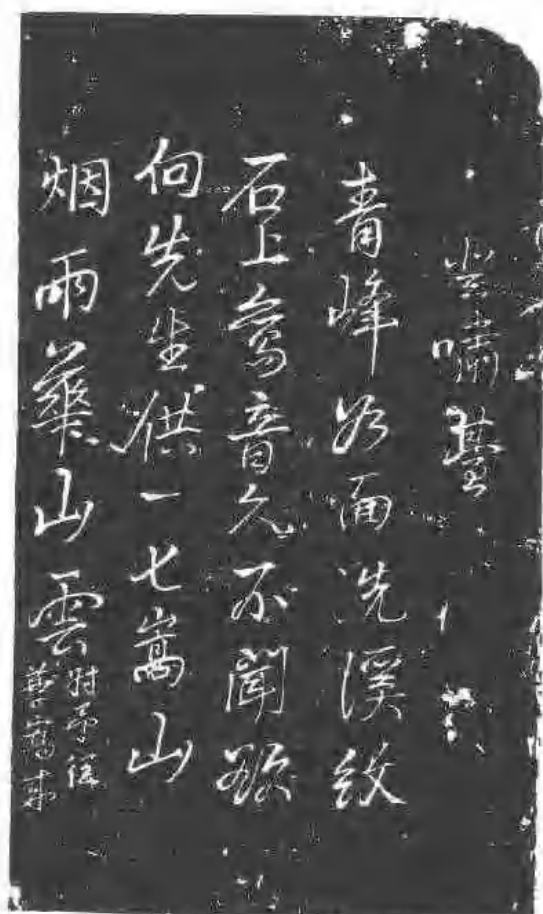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爲了給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爲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爲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采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並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采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袁宏道手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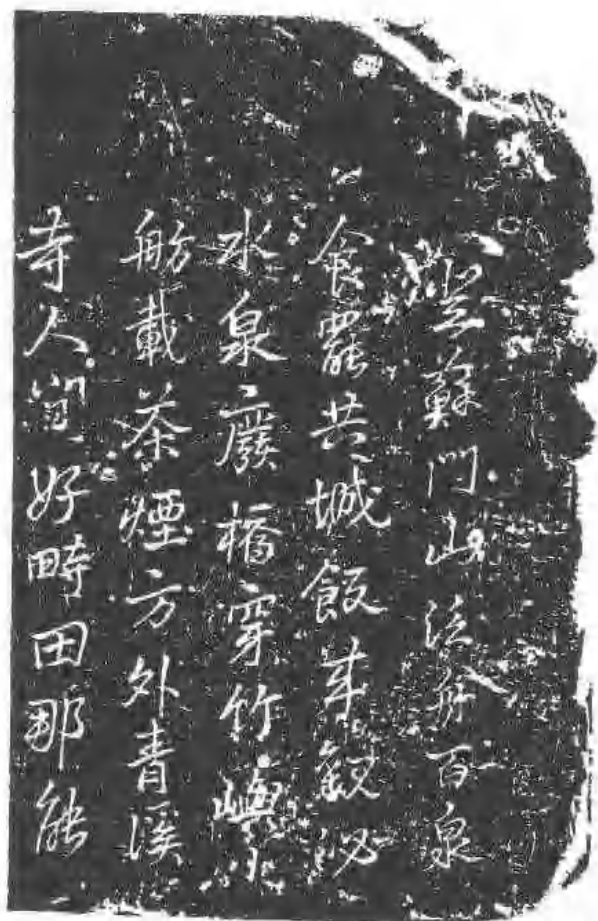
書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

安樂窩

天津橋上沙圍窟
共伯城邊石吐泉
料得先生都
不
管
事
時
如
月
去
如
煙

袁宏道手蹟(二)

書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



袁安道手蹟(三)

書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

昔二
風雨
肅其
曠
二
一
莫
塘
上
孤
雲
信
所
如
東
亭
觀
羨
箭
西
出
訪
幽
居
靜
愛
澗
波
翠
深
憐
避
餌
奠
未
家
狂
既
藉
沉
湮
汚

袁安道手蹟(四)

晉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

清虛

再法

欲去復停
棹瓶甌尚
在船異
波子種
色密
雨一湖
泉有鶴
山中
夢無人
池上
絃醉
歸

袁宏道手蹟(五)

書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



袁宏道手蹟(六)

書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

前 言

錢伯城

袁宏道，他的更爲人所熟悉的名字是袁中郎，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具有個性、最有特色的作家之一，同時，也是一直有爭議的作家。他生於明朝隆慶二年（一五六八），卒於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只活了四十三歲，一生正式從事文學活動的時間不過十多年，留下了一部詩文集，身後毀譽不一。明朝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追隨者，以及一些具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像李贄、湯顯祖等人，是極爲推重他的。但是到清朝，就不大受重視了。清朝人有機會就要貶他一下。

清初人做詩，講盛唐「法度」；中葉以後，盛行學宋朝的江西詩派，鍛字煉句，務求精深。袁宏道自稱他的詩「信心而出，信口而談」（《張幼于》），在清朝人看來是「野狐外道」，自然難入他們眼中。清朝的散文，是古文家的天下，桐城派、陽湖派相繼而興，文章講《史》、《漢》筆法，袁宏道的小品文不管寫得多麼清新活潑，妙語連珠，也無插足之地。只有兩個卓有識見的無名選家，編了一部《古文觀止》，選入了袁宏道寫的《徐文長傳》，算得他的一大知己。但是占他作品數量頗多的書札、遊記（我認爲這是中國古代散文中精品），仍不能進入莊重典則的「古文」之林。作爲桐城派正統讀本的《古文辭類纂》裏，就排不上他這些文章的位置。

乾隆皇帝編《四庫全書》，發現袁宏道集子裏的一通書札和一首詩，「有偏謬語」，當即下令「抽毀」。什麼「偏謬語」呢？原來有幾句罵元朝的話。人家罵元朝關你清朝何事？不行，這也犯忌，怕你由此及彼，指桑罵槐。這也證明，凡屬君臨人民羣衆之上的專制統治者，無不犯有惡性的疑忌狂。因此不單那兩篇詩文「抽毀」，連其他找不出「偏謬語」的所有著作也全部列爲「禁書」。當然民間仍在流傳，這是禁不住的，但官方是把它開除了。餘波所及，清朝的這個「官方」意志，民國以後還在繼續執行，兩部收羅宏富的叢書《四部叢刊》和《四部備要》，就始終屏而不收袁宏道的文集，儘管這兩部叢書的主編者不會不知道他是起過重要影響的作家。

三十年代，袁宏道忽然走起運來，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袁中郎熱」。爲一個長期被沈鑫誤會的作家刷洗塵垢，原是好事；不幸的是，他這次被人「畫歪了臉孔」，使他又一次蒙上了不白之冤。林語堂們提倡小品文，作爲提倡文學上的一個流派，原也無可厚非，但是他們擡出袁宏道做招牌，大談其性靈、閑適、趣味等等，不管他們的主觀意圖如何，所造成的客觀效果却很清楚，就是在民族災難深重的時刻，借袁宏道的名字，便於某些人，并迷惑了一大批人，作爲他們逃避現實、對抗革命的「永久的巢穴」。幾百年受到冷落的袁宏道，這次被裝扮成爲不問世事的雅趣文人，出現在廣大讀者面前。

魯迅針對這一情況，認爲應該爲袁宏道說幾句話了，他作出了犀利的評論：

就以現在最流行的袁中郎爲例罷，既然肩出來當作招牌，看客就不免議論這招牌，怎樣撕破了衣裳，怎樣畫歪

了臉孔。這其實和申郎本身是無關的。

申郎還有更重要的一面麼？有的。萬曆三十七年，顧憲成辭官，時申郎「主陝西鄉試，發策，有『過劣巢，由』之語。監臨者問『意云何？』袁曰：『今吳中大賢亦不出，將令世道何所倚賴，故發此感爾。』」（《顧端文公年譜》）申郎正是一個關心世道，佩服「方巾氣」人物的人，贊《金瓶梅》，作小品文，並不是他的全部。

申郎之不能被罵倒，正如他之不能被歪歪。也因此就不能作他的蛀蟲們的永久的巢穴了。（且介亭雜文二集·招貼即扯）

魯迅的分析是極為精闢的，又一次使我們受到很大教益。他總是能够全面地觀察一個人：對人，不求其全；但看人，必看其全。他把被「肩出來當作招牌」的論客們「歪歪」了的袁宏道改正過來，對我們瞭解并評價袁宏道至關重要。他用袁宏道對顧憲成的看法，來衡量袁宏道對政治和現實的態度，是很有說服力的。顧憲成是東林黨領袖，東林黨是以議論國事、批評朝政、反對宦官著名的。袁宏道關心并佩服這樣的人物，稱之為「大賢」，并且認為朝廷不知重用，「世道何所倚賴」，他的政治傾向是够鮮明的了，而這正是瞭解和評價袁宏道的「全部」所不可抹煞的事實。

袁宏道的關心世道，在他的作品裏也有很多反映。他少年時寫的《古荆篇》，就是感慨張居正身後籍沒，諷諭神宗的刻薄寡恩。「名臣何必貴，衰廢據要津」（《嘉魚李太清書齋》），是他對朝廷上正臣黜退，邪臣當道的慨嘆。人民的生活，也時在他的念中：「邸報傳來悶，民膏到處難。東南供費極，不忍更凋

殘。」（《初夏坐孫內使池臺》）神宗爲重建新殿，不顧民力，運木萬里，他寫了這樣沈痛的詩句：「長年千許人，餐餐損郵食。目今事戎馬，公私敝已極。」（《送梅子馬督木北上》）「賈客相逢倍惘然，櫻楠杞梓下西川。青天處處橫璫虎，鬻米陪男償稅錢。」（《竹枝詞》）「璫虎」指宦官，是袁宏道所深惡痛絕的，在描寫荊州人民的痛苦生活時，他也毫不留情地指責了他們：「居民耗損，市肆寂寥。……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竊奇之腹，復何所厭，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豈有命哉！」（《答沈伯函》）萬曆年間一個極大的弊政是礦稅，荼毒天下，民不聊生，《猛虎行》作了正面的揭露：「甲蟲蠹太平，搜利及丘空。……」用辭的激烈，即使在同時代人的作品中也是很少見的。

當然，袁宏道也有其另外的一面：置身是非之外，寄情山水之間，獨善其身，清高閑適，他的這種思想是極爲濃重的。他的不少詩文，寫的是身邊瑣事，生活情趣，個人牢騷。他之被某些樂於逃避現實的人們看中，奉爲閑情逸致的祖師爺，不是沒有來由的。但是，正如杜甫雖然稱爲「每飯不忘君」，却不可能要求他做的首首詩都在想念皇帝，我們看到杜集裏更多的還是抒情寫景之作，但杜甫仍不失爲偉大的反映現實的詩人；袁宏道雖然「關心世道」，也不可能要求他成爲「憂國憂民」的志士。這取決於他的生活經歷、個人情趣和處世態度。袁宏道的可貴，在於他的坦率 and 真誠。這樣的作家，面對黑暗的現實，而又無能爲力，不能不產生苦悶和矛盾的心情。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邸報東作一簣灰，朝衣典與栽花市。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

字。旁人道我真贖贖，口不能答指山翠。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言既無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沈醉？眼底濃濃一杯春，慟於洛陽年少淚！（《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爲韻》之二）

酒和淚混在一起，以歌當哭，對腐敗的朝政是憤懣極了。「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字」，這顯然是反語正說，若信以爲真，就上他當了。「旁人道我真贖贖，口不能答指山翠」，他在表示憤懣之餘，却又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消極情緒。這種消極情緒，造成了他對現實的逃避。但是從總的方面來看，袁宏道仍是一個關心世道的作家，而且由於他的「方巾氣（即道學氣）很重，他還是一個維護儒家正統思想的作家。

三十年代魯迅同林語堂們關於袁宏道的論爭，是一場有關知人論世的是非之爭。在這場論爭中曾被魯迅批評過的某些人，後來在民族存亡不絕如縷、戰火遍地的緊急關頭，上者遯跡海外爲寓公，下者就沈淪墮落了。但是這同袁宏道無關，不能把責任推到袁宏道身上。正如魯迅指出的，「中郎之不能被罵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畫歪」，這對我們是很有啓發意義的，否則的話，我們就會老是把被三十年代某些論客們「畫歪了臉孔」的袁宏道，當成真的來相信了，以至連他的著作也不敢欣賞、閱讀了。

明朝文學的復古與反復古之爭，主要表現在詩歌的創作問題上。

清朝人笑袁宏道的詩俚俗淺薄，他們完全不理解，這正是袁宏道和公安派作家的特色之一。在這

點上，他們的文學知識遠遠不及不上編選《列朝詩集》的錢謙益。

中國的古典詩，經過唐、宋兩代的興旺發展，形式、意境和文字藝術等等方面，都已不易翻新了。明朝前，後七子宣稱「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他們取法乎上，意在尋找一條詩歌創作的新路，不能說全無道理。他們也曾寫有一些好的作品，氣勢宏大，意境開闊，是明詩中的上乘之作。但是，復古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創新，這是文學發展的一條規律。唐朝的韓愈和宋朝的歐陽修，都是復古的大師，他們先後領導兩次古文運動，復古是名，創新是實，因而推動了文學的進步。復古而不創新，必然成爲倒退。七子不懂文學發展的這條規律，一心一意用模擬代替創新，表面上豪言壯語，氣勢磅礴，仔細一看，全是句比字擬，一無生氣。文學上產生這種倒退現象，而且統治時間長達近百年之久，實際上反映了古典詩歌發展到這一階段走投無路的窘境。

明朝當時有許多有才能、有見識的作家，並不滿意七子的做法，但又受其牢籠，無法自拔。較爲突出的一個例子，可以舉出趙南星，這是一個才氣縱橫（甚至傳說他就是《金瓶梅》的作者），最不願俯仰由人的作家，但是據錢謙益說，他「爲詩厭薄七子，刻意濯磨，而步趨北地（李夢陽），不能出其窠臼」（《列朝詩集小傳》）。錢謙益是趙南星委託刪定文集的知交，又是學識淵博、眼光銳利的詩歌評論家，他的話當是按實際情況說的。這說明明朝這股復古的勢力對作家們的束縛之大。詩歌若不另闢蹊徑，別謀出路，這股復古的風還有可能吹下去。